

论宋代江西进士的文化贡献与学术价值*¹

李懿 刘双琴

宋代江西籍进士在文学、史学、经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破弃陈规，大胆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其成就是两宋文化发展演变史上令人瞩目的组成部分，对江西当地乃至整个宋代社会的文化体系和时代审美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文化创造充分彰显出江西地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宋代；进士；江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7）11—0112—08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拐点。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称华夏文明历经数千年层累性地积淀与嬗变，终于在宋代臻至巅峰。宋代文化的这种繁荣昌盛之势和江西地区的文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便利的地理形势、坚实的经济基础及良好的人文氛围为江西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大力施行，才学之士通过选举跻身朝堂，推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政治、军防特别是文化事业的进步。据统计，两宋共有江西籍进士 6458 人，其中北宋 2072 人，南宋 4378 人，登第朝代不详者 8 人。他们凭借丰富的著述及相关文化活动，对江西当地乃至整个宋代社会的文化体系和时代审美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迈《容斋四笔》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东、西，冠带诗书，歛然大盛。”^{[1] (P376)}从宋代开始，江西衣冠文明之盛位列闽、浙之后，这和进士们的努力密不可分。全文意在钩稽爬梳文献史料，宏观揭示出宋代江西进士的文化成就，进而阐明江西文化的地域价值和在宋代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

一、宋代江西进士的文学成就

宋代江西进士的文化成就首先体现在文学方面。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2] (P2799)}，进士们的文学造诣有三个特征：一是进士整体人数众多，文学领域硕果累累。据粗略统计，宋代有作品传世的 770 名江西籍进士中，北宋有 297 人，作品总量计 29950 首（篇），南宋 473 人，作品总量 38614 首（篇），宋代江西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中，由进士创作的就占了四分之三。宋代有文集及经史类著作的江西籍进士达 517 人，其中有文集者 412 人，拥有文集的进士占了宋代江西拥有文集人数总量的 60%以上。进士个人创作的文集大都有几十卷甚至上百卷，个体创作总量排名前五位的是周必大、杨万里、黄庭坚、朱熹、欧阳修。二是一部分进士以文学家族的形式推动了文学的繁荣，如南丰曾巩家族、临川王安石家族、清江三孔家族等。三是进士本人在文学领域博采众体，一个人往往同时兼擅诗、词、文等各种文学体裁。比如欧阳修专工古文写作，但他在诗、词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又如黄庭坚以长于宋诗著称，不过他的词作与文章仍有鲜明的特色。

宋诗是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然而宋诗的写作内容比唐诗更广阔，技巧也比唐诗更为精细。^{[3] (P30-41)}江西进士对宋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吕肖奂《宋诗体派论》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论述了各派的关键性人物和诗歌特色，书中归纳性地指出欧阳修为宋调初创期新变派的典范，其次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体”承接了宋调的发展，再次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是宋代最著名的诗歌流派，象征着宋调的典型，继而杨万里“诚斋体”的出现标志着宋调的转型，而在宋末，谢枋得、文天祥等遗民诗人一振萎靡积弱之音，宣扬起强烈慷慨的爱国悲歌。这种观点对江西进士的诗歌成就进行了中允评判。

¹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16LS05）

李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刘双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06）

宋调的开辟者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理论，针对西昆体雕章琢句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有力批驳。欧阳修受韩愈的影响，将散文句式和议论手法融入诗歌创作，《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其二对王昭君出塞的故事表达了别致的见解。并且欧阳修的部分诗作情韵俱佳，《戏答元珍》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心灵观感灌注于字里行间，感情充沛而真挚。在宋调的发展之路上，王安石起到不小的作用，他突出诗歌的实用价值，创作了一些揭发社会现实的篇章，而且他擅长议论，《明妃曲二首》是耳熟能详的名作。但其早年诗作伤于直露，当他晚年退居江宁后诗风渐趋含蓄深婉。黄庭坚称：“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4] (P235) 王安石之后，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将宋调发展至巅峰。缪钺《论宋诗》云：“宋诗至此，号为极盛……黄之畦径风格，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3] (P30-41) 黄庭坚强调以学杜为典型，崇尚“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诗风。江西诗派中的洪刍、洪炎、徐俯、汪革等皆为进士，此派诗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宋调“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的特征。江西诗派对宋人渗透至深，杨万里早年即从江西诗派入手，最后突破江西藩篱而自成一家。他的诗清新明快，富有谐趣，所谓“不笑不足以诚斋之诗”。南宋晚期，江湖诗派风行一时，此派诗歌气格卑弱，视域琐碎，遗民诗人文天祥一扫此风，一曲《正气歌》震撼人心，掀起宋末诗坛的最强音。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词之演进，江西进士功不可没。晏殊继承五代南唐、花间词派婉丽柔美的词风而有所创新，其词总体呈现出一派富贵气象，他的《片玉词》主要描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涤除了对情色露骨的描摹，将叙述重心转向主人公的恋情本身。欧阳修和黄庭坚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促使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方向开拓，将词的题材逐渐引向日常化。^[5] (P28-88) 宋词主要分为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和以李清照为首的婉约派。和辛弃疾同时代的江西进士杨炎正、京镗等皆是豪放派的重要人物。宋末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遗民词派，其中坚力量刘辰翁、文天祥等人的词风洒脱豪迈，被视为辛派后劲。

宋文方面，“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人皆为江西籍进士。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发起了“古文运动”，主张有为而作、文道并重，学习韩愈古文的文从字顺。欧阳修之文工于议论，情辞并茂。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欧文推崇备至：“执事之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其时在文坛和欧阳修齐名的还有王安石和曾巩。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丙编“江西诗文”条载曰：“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6] (P5344) 王安石看重文章的实用功能，其《上人书》提出文章要“有补于世”。他有部分文章篇幅短小，说理精到。其《读孟尝君传》仅九十余字，议论一波三折，词气凌厉浩然。《答司马谏议书》不足四千字，文笔慷慨，言约意丰。曾巩尝求学于欧阳修，曾文平实古雅，结构谨严，其名篇《墨池记》立论新颖。除欧、王、曾三人之外，胡铨的政论文、汪藻的四六文在有宋文坛皆较为突出，引人注目。

江西进士在其他文学体式上也有成就，如欧阳修《六一诗话》，是我国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又如洪迈《容斋随笔》，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有见地，四库馆臣誉其为“南宋笔记之冠”。综上，江西进士对宋代文学的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二、宋代江西进士的史学成就

自晋唐之后，宋代史学发生了许多新的嬗变：记注之法日趋完善；史料自由开放、大量印刷与私人修史事业鼎盛；史学批评风气弥漫；历史考据学盛行；纪事本末等新史学体例出现。^[7] 相当一部分江西进士创作和编纂了数量可观的史学著述，并在史学体裁和门类方面开创了新的范式，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有：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刘恕主编《资治通鉴》、刘敞《春秋传》《春秋权衡》《春秋说例》、刘攽《五代春秋》《内传国语》、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朱熹《通鉴纲目》、洪皓《春秋纪》《松漠纪闻》等。最具特色的史籍有以下几部，它们在内容和体例上皆为后世史学修撰提供了借鉴的模式。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唐书》二书拉开了宋代史学兴盛发展的序幕。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欧阳修用 18 年的时间完成鸿篇巨制《新五代史》74 卷，叙述时间从梁开平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全书分为本纪 12 卷、列传 45 卷、考 3 卷、世家及年谱 11 卷、四夷附录 3 卷，篇幅虽不及《旧五代史》一半，却补正了《旧五代史》沿袭五代各朝实录回护之处，堪称“良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赞“欧史书法谨严”。《新五代史》在义例上追溯《春秋》笔法，崇尚“微言大义”的表达方式，率先竖起褒贬史实的旗帜。陈师锡《五代史记序》对欧阳修善用史家笔法进行了赞扬：“五代距今百有多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多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至于论朋党宦女，忠孝两全，义子降服，岂小补哉，岂小补哉！”^[8]

^(P18003)《新五代史》在行文表述中频频出现“呜呼”等带有感情色彩的字样，明确寄寓着欧阳修对史实的评判态度，但这种融入主观评价的褒贬态度也受到清代赵翼、钱大昕、王鸣盛、邵晋涵等人的质疑。

庆历四年，宋廷开始编纂记载唐代历史的《新唐书》，至和元年欧阳修任刊修，与宋祁、范镇、曾公亮等人共同修纂此书，主持本纪、志、表部分的编写，嘉祐五年，《新唐书》终于编纂完成。曾公亮上书君主，称《新唐书》最突出的优点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以此别于《旧唐书》。欧阳修在编纂过程中兢兢业业，考证精良，负责编纂的志、表深受到赞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即曰：“《新书》最佳者志、表。”^[9] ^(P966)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浩大的编年体史书，共计 294 卷，分别以时间、事件为纲和目，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间的历史事迹。刘昉、刘恕广采众书，精细考订，为该书的问世付出了巨大的辛勤劳动。《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后世史书编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出现了因体裁而续书、变其体裁而改书、因其书而新创体裁等现象。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共 59 卷，采用新的史书体式“纲目”体，仿《春秋》为“纲”，用大字顶格书写列出提要，又仿《左传》为“目”，以小字注文的形式阐明内容，低一格书于“纲”之下。此体例由朱熹所定，“纲”的部分概由朱熹及其门人撰成，“目”的部分则由门人赵师渊编撰完成。此书的叙事时间与《资治通鉴》一致，虽然史料价值不高，不过编排体例明晰，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历史的褒贬态度十分明确。

此外，绍兴年进士徐梦莘因深感北宋亡国之痛，故搜罗旧闻，编纂成《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该书叙述的时间始于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至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败亡，共计 45 年。作者在自序中提到编此书的目的就在于“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淹没也”。《三朝北盟会编》中广泛引用于前史原文，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等一一俱载，作者不下论断，意在客观呈现史料原貌，不过作者的观点仍能从材料的取舍中窥见一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此书征引之富，云：“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10]

^(P675)

在宋代，史学领域有一个重要的分支——金石学，宋人对金石搜集、著录、考订、应用无不用力，金石学发展之迅速，这和刘敞、欧阳修、洪迈、洪遵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刘敞知识渊博，平居时对金石器物兴趣尤浓，他和欧阳修有过共赏古文碑碣、饮酒助兴的雅事，也对宋廷秘阁所藏秦昭和钟、李斯石碑等加以品评鉴赏，开辟了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先河。刘敞将自己收藏的十一件先秦时期制作精巧、有科斗款识的古器编成一书，名为《先秦古器记》，书中详细考究古器的年代、出土地点、功用、形制、铭文等，概括出“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的研究方法。

从庆历五年至嘉祐七年，欧阳修搜集碑帖、鼎铭、刻石等，辑为《集古录》一千卷，此书年限上自周穆王，下至秦汉隋唐五代，所有金石文字靡不毕载，其编纂目的在于“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从而奠定了宋代金石学研究的基础。朱熹《题欧阳公金石录序真迹》称“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欧阳修探讨金石学的心得即《集古录》之精髓，主要见于《集古录跋尾》十卷。《跋尾》为后人提供了金石考察的一些具体思路，如用金石文献补正史书记载、考证典章制度、展开古文字研究等。欧阳修以《跋〈隋韩擒虎碑〉》订正《隋书》列传记载之误，用《唐康约言碑》《唐梁公儒碑》证明唐代“置使”为宦官之职，充分体现了以金石治史的治学理路。

《集古录》问世以后，洪适《隶释》《隶续》、洪遵《泉志》等金石著述相继成书。乾道二年，洪适编撰成《隶释》27卷，系统汇集了东汉光武帝建武至魏明帝黄初二百年间石刻碑碣一百八十种，洪适将这些隶书碑文以楷书写成，并为每篇金石文字撰写题跋和予以阐释。《隶释》是一部较早钻研汉魏石刻文字的专著。约在淳熙七年，洪适在此书基础上“辑录续得诸碑，依前例释之”，编成《隶续》21卷并刊印于世。《隶续》最显著的特点不仅是著录石刻文字，还保存了大量的汉魏石刻图像。绍兴十九年，洪遵所撰《泉志》成书，计15卷，书中收录上古三代至五代的各类钱币三百余种，其中不乏珍稀钱币和异国钱币，洪遵将其分门别类，划为正品、伪品、不知年代品等九大类，用和前代相比较的方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审定。此书文献价值颇高，是我国第一部考订较为完整的钱币学著作。

三、宋代江西进士的经学成就

宋代是经学发展的核心时期，这一时期学派林立，名家辈出。以黄宗羲《宋元学案》为例，书中收录以江西进士为主导人物的学案共有十个，依次是：卷四欧阳修“庐陵学案”，卷四六汪应辰“玉山学案”，卷四八朱熹“晦翁学案”，卷五八陆九渊“象山学案”，卷五九刘靖之、刘清之“清江学案”，卷七七傅梦泉“槐堂学案”，卷八四鄱阳三汤“存斋晦静息庵学案”，卷八八欧阳守道“巽斋学案”，卷八九董梦程“介轩学案”，卷九八王安石“荆公新学”。这些学术派别的出现，标志着宋人博学尚识的智慧光芒。比如以欧阳修为核心人物的庐陵学派，重视人事，大力倡导儒家学说和礼义教化，又从疑古的角度，对经书及其传注重新进行大胆阐释，且对佛教和迷信思想加以深刻批判。欧阳修高弟王安石开创的荆公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庐陵学派的思想，以理性的态度审视儒家经书。王安石重新诠释《诗》《书》《周礼》，编成《三经新义》，颁布全国，巩固了儒家的领导地位，他的《洪范传》《淮南杂说》等文字为学者争相传读。这一派坚信世界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生生不息、新故相除的结果，故而呼吁革旧趋新，推行新法。在宋代经学史上，杨万里的易学也极具特色。《宋史》将杨万里列入《儒林传》，《宋元学案》将其列入“赵张诸儒学案”张浚门下。杨万里能够立于儒林，一方面是因为他一生耿直磊落、践行儒学，另一方面就是他留下了许多关于儒家经典阐释的著作《心学论》《庸言》《诚斋易传》等。《诚斋易传》初名《易传》，凡历十七年始成，虽然此书在后世饱受争议，但杨万里能够做到引史证经、以史证易，探求易学的实践意义，颇为不易。全祖望《跋〈杨诚斋易传〉》、钱大昕《跋诚斋先生易传》予以非常高的评价。其他各派的思想亦自成特色，大体呈现出沿袭和创新的演进趋势。

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派和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学派是宋代最为显赫的思想派系。宝庆三年、淳祐元年宋理宗两次下诏，褒扬朱熹义理之学。朱子学说被立为官学后，这对士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和精神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士人们重视道德修养，亲身实践省察、克治、存养等“为学功夫”，以学习儒家圣人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为终极目标。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置诸“五经”之上，意图使道德性命、政治伦理等理学命题皆可从四书中寻找到立论基础。朱熹对科举之学也进行了责难，他还借助书院讲学的形式在民间大力宣扬理学思想。葛兆光总结朱熹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有三点：一是“通过经典诠释、历史重构以及对思想世俗化的努力，再度确立了所谓‘道统’”；二是“重新凸显了作为思想依据的‘经典’，指示了理解经典意义的新的途径”；三是“通过思想的一系列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努力，使那些本来属于上层士人的道德与伦理原则，渐渐进入了民众的生活世界”。^{[11] (P226-232)}以汪应辰为首的玉山学派和以刘清之、刘靖之为首的清江学派虽不完全宗朱学，不过他们的思想构成都和朱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晚期朱学的中坚力量欧阳守道撰有《巽斋文集》，他曾受江万里聘，创办白鹭洲书院，文天祥、刘辰翁等皆出其门下。董梦程是理学家董铢之子，董铢乃朱熹高弟，梦程自幼受学于其父，后从学于朱熹女婿黄榦，得朱学之真传，是朱学自鄱阳流入新安一派的代表。

淳熙十三年，陆九渊在象山精舍讲学，其能言善辩，招徒众多，与其兄陆九龄被称为“江西二陆”。陆九渊思想的核心重在阐发“本心”之意义，强调本心是道德原则的本源，指出人皆有是心，心即是理，因此有“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12] (P440)}“六经皆我注脚”^{[12] (P395)}之语，坚信通过个体发明本心来实现道德圆满。在为学工夫方面，陆九渊认为格物穷理是末而非本，提出“尊德性而后道问学”的观点，反对盲目迷信外在经典的权威。淳熙二年夏，吕祖谦邀朱、陆及其他学者相聚信州铅山鹅湖寺，共同讨论学术异同，这次辩论十分激烈。朱陆学说的分歧主要在于：陆九渊强调尊德性，讲心即理，重明心；朱熹强调道问学，主性即理，重格物。^{[13] (P227)}淳熙二年进士傅梦泉从学于陆九渊，其所主槐堂学派竭力宣扬心学。尽管朱陆学说存在着分歧，此时却出现了“会同朱陆”思想的学术趋势，鄱阳汤千、汤中、汤巾宗学朱子的同时也问学于陆九渊。陆

氏逝世之后，“心学”相对“朱学”沉寂了很长一段时期，至明代中期，王阳明对朱学进行反拨，心学再次复兴，一度成为明代显学。

四、宋代江西进士的艺术及教育成就

宋代进士在古琴、舞蹈、戏曲、绘画等艺术领域也有突出的成绩，其在书法上的成就尤为突出，有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他们擅长的书法字体各有千秋，并对书法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晏殊工于飞白，《飞白书赋》是其关于这种书法体式最集中的论述。《书史会要》云：“元献擅篆籀，其迹杂见《群玉堂法帖》中。”欧阳修《学真草书》自述练习书法的热情：“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刻苦的锻炼令欧阳修真书、草书兼擅，加之其在编撰巨著《集古录》时收集了繁多的碑刻墨迹，因此他在书法理论和鉴赏方面得到极大的提高。王安石性格刚硬雄健，字如其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夸赞其字“清劲峭拔，飘飘不凡”^[6] (P4644)，认为其字妙在天而成。朱熹的书法亦有独到之处，其师法汉晋，“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旧题朱存理《赵氏铁网珊瑚》卷四）。

宋代江西进士中书法成就最高的当属黄庭坚，黄氏书法有“宋四家”之美誉，黄庭坚书法的显著特色是“瘦劲老成”。黄氏曾转益多师，二王、柳公权、颜真卿、怀素、张旭等前代书法大家皆是其临摹学习的对象，并且他又从自然万物中汲取创作灵感，深得“江山之助”。黄庭坚书法的“瘦劲老成”和其文学的“瘦硬通神”、其人兀傲子立之品格彼此映照。这种“瘦劲”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行书、草书创作上。崇宁元年，黄庭坚因党争而被贬鄂州，为此而作《松风阁帖》。此帖继承王羲之行书的特点而有所发挥，笔画以侧险为势，以横逸为功，颇具老成之态。而黄庭坚的草书堪与唐代怀素、张旭等并驱，其《跋此君轩诗》自述自己的草书成就了得，称“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乃余三人悟此法耳”。黄庭坚还对书法理论提出不少新的见解，《山谷文集》中有数篇讨论书法创作理论的“论书”文。黄庭坚在这些文章中强调“尚意”“重韵”的思想，他认为“书字便如人意”，学书不仅要注重艺术技巧，更要体悟作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内在神韵之美，提出书法忌随人后，指出胸次高迈与博学多才才是写出好作品的必要前提。这些理论为后世书法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江西进士在艺术上的成就，与江西进士对教育的重视密切相关。宋代江西进士凭借一些重要的书院活动和刻书举措来弘扬地方文化，培养人才，进而从整体上加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教育是文化发展的根本，书院作为高等的教育形式，为文化的兴旺培育了不计其数的饱学之士。宋代江西书院数量众多，据夏汉宁等《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统计，共有 278 所。在大规模重视教育的环境下，宋代进士通过兴办书院、亲自讲学等活动，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兴学之举始自晏殊，他创办了应天府书院，并邀范仲淹、刘恕等前去讲学。在星罗棋布的书院中，最著名的是朱熹主持重建的白鹿洞书院。淳熙六年，朱熹赴职南康，他查阅图谱和实地勘察遗址后，对如今书院的废止深感遗憾，于是将修复书院的计划上告朝廷，并令属下着手准备相关事宜。尽管这次重建计划没有得到朝廷的资助，但在朱熹的主持下，书院于次年重建完成。其后，朱熹进行了很多举措来复兴白鹿洞书院，如延请陆九渊、黄榦等院外名士来授学，在教学方法上鼓励学生自主求学、相互切磋。朱熹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部分，此规一出，快速推广于全国各地的书院，宋理宗将此学规颁敕各州府县，这对后世的教育方针提供了有力的参照维度。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赞曰：“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14] (P175) 宝庆二年进士江万里兴办的白鹭洲书院，后来由欧阳守道担任山长，不仅教育水平高，且旨在宣扬“忠义”爱国的儒家思想，最终培养出刘辰翁、文天祥这样的爱国志士兼文学家。

由进士主持兴办或重建的家族书院也是江西书院的一大特点。江西较早的家族书院为抚州乐史创办的慈竹书院、南丰曾致尧兴办的曾氏学舍、曾巩所办的兴鲁书院。类似的还有桂岩书院，庆元五年进士幸元龙在嘉定年间重修了自家的书院，一心培养家族子弟以及四方好学士读书习礼。这些家族书院以培育科举之士为目标，为国家诞育出为数众多的进士、举人等人才。

和书院教育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并行的是刻书业的昌盛，宋代江西是继四川、福建、浙江之后的又一较为发达的刻书中心，其中南昌、抚州、赣州、吉安、上饶等地刻印之业兴盛，官刻和私刻都十分有名，刻书业的出版多寡标志着文化事业的盛衰。“庐陵四忠”之一、南宋著名文学家兼政治家周必大晚年退居家乡后，积极从事于刻书事业。庆元二年，周必大广采诸本，加

以参订，刊刻其乡贤欧阳修所撰《欧阳文忠公集》，这对后世影响巨大。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欧集》，初苦无善本，此本一出，《欧集》遂有了定本。^{[15] (P496)} 清末藏书家傅增湘称赞此本“初印精善，远胜各家藏本”^{[16] (P1040)}。周必大还奉宋孝宗敕命，重新对北宋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并将此书刊刻于世。又如朱熹任职南康时，刊刻了其父朱松文集《韦斋集》12卷。南宋鄱阳学者洪迈自行刊刻其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101卷。

五、宋代江西进士的科技成就

宋代江西进士在农业、水利、天文、地理、医学等科技方面的成就亦不容小觑。农业方面，曾安止及其《禾谱》为人所称道。曾安止为熙宁九年进士，约在元祐五年至绍圣元年著成《禾谱》五卷，今仅有残篇存世。此书是继贾思勰《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农业专著，讨论了50余种水稻的名称、生长期、外形、原产地等情况，对中国的水稻栽培和粮食生产意义重大。苏轼与曾安止相交，赞美此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但惋惜其有所缺失，不谱农器，而后苏轼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秧马歌》，将之附于《禾谱》之末。嘉泰六年，周必大为《禾谱》作序，曰“考之经传，参合今制，无不备者”，称赞此书考订核实。曾之谨，曾安止侄孙，绍熙元年进士，撰有《农器谱》，探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问题。陆游作《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褒扬此书的农用价值。在水利建设方面，庆历六年进士侯叔献尤为杰出。侯叔献，字景仁，他长期奔走于各地，察看地势，掘湖建堤，开引支流，援樊、汴水治理盐碱地，引京、索二水，开辟河道，以便漕运。又主持引汴入蔡，开河二千里，用于灌溉。

宋代进士在天文、地理及医学领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曾民瞻字南仲，宣和三年进士，著有《晷漏》。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详细记录其改进晷漏和制作晷景图的过程。宣和六年进士周执羔，撰有《历议》《历书》《五星测验》等，后来又在《统元历》的基础上编撰成《乾道新历》。乐史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撰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此书约130万字，是一部综合性的全国地理志书。医学方面，李浩字德远，绍兴十二年进士，著《伤寒钤法》。洪适之弟洪遵精通钱币学，且对方剂学也颇有心得，撰有《洪氏集验方》5卷，《丛书集成》初编收录此书。

综上，宋代进士在文学、史学、理学、艺术、教育、出版、农业、水利、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勇于破弃陈规，且一个人往往身兼多种才艺，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光彩夺目，是宋代文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的文化成就也生动体现出江西地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价值。有关江西文化与进士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关注的话题，尚待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 [1] (宋)洪迈. 容斋随笔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2] (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缪钺. 诗词散论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4] (宋)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5]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6]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7] 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 [8] (宋) 欧阳修. 新五代史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9] (清)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10] (清)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1]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12] (宋) 陆九渊. 陆九渊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3] 陈来. 宋明理学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 [14] (明)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 [15] (宋)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6] (清) 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